

# 闲聊刘晓波

作者：王辉云

7月3日，中国著名异见人士、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逝世，消息传出，举世哀悼。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当天发表声明说：“在为中国自由、平等和宪政而斗争的过程中，刘晓波彰显了诺贝尔奖所表彰的人文精神。他至死不渝地完全印证了诺贝尔委员会做出的选择。”

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共和党总统获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也发表声明指出：“刘晓波的狱中之死代表了北京当局对刘晓波博士为之奋斗终身的个人权利的极度践踏。……这是共产党中国摧残人权、民主和自由的最新一例。”

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在她的声明称赞刘晓波是我们时代伟大的道德声音。她呼吁：“我们必须继承刘晓波的遗志。美国必须履行自己的道义责任，为中国许许多多为争取更自由和更有希望的未来而被当局投进监狱的记者、人权律师、民主活动人士、捍卫宗教自由的人士大声疾呼。”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称刘晓波的去世让中国和世界的人权运动“失去了一位坚定的引导者”。他赞扬刘晓波的行为界定了公民勇气和人类尊严，称他是一位希望自己国家有一个更好未来并为之奋斗的诗人 and 知识分子。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也就刘晓波逝世发表声明说：“刘晓波因其推动实现在国际文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被确保的基本人权所付出的努力于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抵抗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压迫行为为增进不同民族间的友爱做出了贡献。”

然而，面对国际社会的压力，中国政府表现出一如既往的顽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外国官员对刘晓波病故发表评论一事表示，中国是法治国家，对刘晓波案的处理纯属中国内政，外国无权说三道四。

自6月26日中国政府宣布刘晓波肝癌晚期、给予保外就医的消息发布以来，刘晓波再度成为新闻人物。许多国家的政府和民间组织纷纷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刘晓波到国外治病，但中国政府对于这种要求，一概予以拒绝。很明显，中共高层早已打定主意，坚决不能让刘晓波给外国政府“添麻烦”，死也必须死在国内。

这让我想起另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奥西茨基的遭遇。193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奥西茨基是第一位在第三帝国的监狱里获奖的记者



作者画像

与社会活动家。但希特勒在奥西茨基病重后慑于国际社会压力还是将其释放，并允许诺贝尔委员会到他家里举行了授奖仪式。因而，奥西茨基得以在活着的时候接受了诺奖，同时也是以一个自由之身有尊严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刘晓波就没这么幸运，因为他面对的不是法西斯政府。

据逃亡海外的中国富豪郭文贵爆料，中共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刘晓波活着走出监狱。无论郭披露的信息是否可信，但从刘晓波死后，中共强迫其家属将遗体迅速火化，并将骨灰撒入大海，让这位没有敌人的人死无葬身之地的一系列做法来看，消灭刘晓波肉身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他们的既定方针。刘晓波死后，中共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有关刘晓波的信息，不要说刘晓波三字，就连空椅子、蜡烛等图片，都在被禁之列。

刘晓波的死无疑是个悲剧。为什么中国政府不惧抗议浪潮，非要如此处理刘晓波事件呢？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为了打压国内日益抬头的自由化知识分子，严惩刘晓波能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我这里所指的知识分子是那些藐视权威、挑战传统、坚持独立人格、维护人类基本价值的人，即所谓“社会的良心”。这种人的存在对于党的权威具有极大威胁，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后日益加强党对社会控制的当下，打压知识分子显得很有必要。虽然经过“反右”和“文革”，党已经把知识分子整得服服贴贴，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国已不复存在。然而，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又有重新抬头的趋势，而刘晓波就是这伙人里跳得最欢的人之一。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刘晓波便以文坛“黑马”闻名于世。他不仅挑战传统和权威，而且还散布“三百年殖民地”和“中国人种缺陷论”等愤青言论，并参与“八九民运”，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和侯建建、高新及周舵并称为“天安门四君子”。这不是公然跟党唱对台戏嘛！为了教训这些人，“六·四”之后，政府对这些人大肆抓捕，刘晓波也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抓并被开除公职。经过这次镇压，有些知识份子懦弱自保，自动消声；而刘晓波却是个一根筋，屡教不改，继续从事民运活动。国内媒体封杀他，他竟敢跑到国外媒体发表“歪理邪说”，这还了得？枪打出头鸟，为了震慑体制内外的异己分子，重点打击刘晓波就顺理成章了。

其次，刘晓波不仅跟中共死磕，而且还能找到其死穴。这种人在中共眼中，当然是最危险的敌人。他刘晓波不仅是写写文章，抨击时政，令当局不能容忍的是，他模仿捷克的异议人士哈维尔，起草出个“零八宪章”。虽说“零八宪章”的大部分条款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有明文规定的，只是要求政府去监督并实施这些宪法已有的东西而已，但他在“零八宪章”的起草连署过程中，搞反革命串联，不仅把先前一盘散沙般的自由派势力组成一个广泛联盟，还为弱小分散但又不断发展的弱势群体提供一个继续整合的平台。这不是为在中国搞天鹅绒革命架桥铺路嘛！

谁都知道，中共忌讳的就是有人胆敢聚众闹事，矛头对着“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尤其是他刘晓波还打着宪政的旗号，高喊“依法治国”，这分明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就凭这一点，刘晓波便成了中共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零八宪章”刚一问世，刘

晓波就注定了要坐牢，果不其然，刘晓波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1年。

再次，惩治刘晓波也是同“境外反华势力”长期斗争的需要。近年来，西方国家总是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评头品足，这让正在崛起的中国领导人感觉很不舒服，“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抓了刘晓波，你们却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他，这不是成心恶心我们吗？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党的体面，中共领袖决意与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进行顽强斗争，反正我的地盘我做主，我把你们捧起来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关进大牢，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碰上中共这样的二杆子领袖，只能说该着刘晓波倒霉。

人们可以明显看到，从重判刘晓波到最后让他死无葬身之地，中共领导人昏招儿迭出，不但未能达到目的，还自毁形象，把自己逼到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他们在客观上为自己制造了大批反对派，同时也为这些反对派树立起一面旗帜，并帮助他们聚集在这面旗帜之下，掐断自己的退路。

虽说刘晓波参与起草了“零八宪章”，并在海外时常发表文章，赢得一些名声，但你说这就能颠覆国家政权？简直是笑话！即使中国老百姓全听他的，那也不过是要求中共尊重人权，推动政治改革，实施宪政而已。重判刘晓波，取消他的言论自由，只能暴露出自己的不自信，也使自己在国际上标榜中国是法治国家、是“负责任的大国”等言论成为笑谈。

中共执政迄今已有六十八年，虽然一直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却没还政于民的任何打算。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经过一个时期的高速发展，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由于政治改革滞后，国内出现很多问题，例如贫富差距拉大，官员普遍贪腐，社会矛盾加剧，使中共的执政合法性产生前所未有的危机。是实行政治改革还是加强“维稳”力度，对中共领袖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遇到刘晓波这样的愣愣之士，应该说是他们的造化。要是有人也像当年毛泽东那样拉着队伍上井冈山，您说党中央该多闹心呀！

刘晓波投身政治活动后，始终坚持一种和平理性的立场，主张跳出“王朝循环”的传统窠臼，通过法律的途径，改变政治现状，以实现政治现代化。他在“我没有敌人”这篇法庭最后陈述中说：“二十年过去了，六·四冤魂还未瞑目，被六·四情结引向持不同政见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监狱之后，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国公开发言的权利，而只能通过境外媒体发言，并因此而被长年监控，被监视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劳动教养（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现在又再次被政权的敌人意识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对这个剥夺我自由的政权说，我坚守着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刘晓波的“无敌论”曾经引起不小的争论。激进的观点甚至认为他是个机会主义者，伺机和中共妥协。这种观点当然片面，用以牙还牙的方式与中共抗争，不但现实可行性令人怀疑，能否真正实现民主亦成问题。当年中共强烈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主张在中国建立



2017年7月13日，民众在挪威奥斯陆诺贝尔奖和平中心外的刘晓波画像前献花哀悼。（法新社）

美国式的民主制度，用暴力方式推翻国民党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目标实现了吗？

手段和目的分离，为了高尚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不仅常常被理想主义者奉为圭臬，也成为中国新的政治传统的主要内容。刘晓波能够主动挑战这一政治传统，证明他的学识和政治智慧还是高人一筹的。当年甘地在领导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对手段和目的的统一强调得近乎苛刻。二十年代初，在他领导的一次全国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只是因为曹里曹拉的几个警察被愤怒的示威者烧死，他立即宣布停止了这场如火如荼的运动。

还有些人认为，刘晓波已被当局投入监狱，人家把你当敌人，你却仍然标榜不把人家当敌人，这是无可奈何的自欺欺人。这种说法不免有“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嫌疑。当年甘地也遇到过这种指责，说你们印度人真刀真枪地干不过英国人，不得已才使用这种消极抵抗（Passive Resistance）的斗争方式；然而，甘地对这种说法特别不认同，他认为把非暴力抗争活动称为“消极抵抗”是一种误解。持这种说法的人只看到了这种抗争的形式，而未理解它的本质。后来，他发明了“坚持真理”（Satyagraha）一词，把他所领导的非暴力斗争定义为“坚持真理”运动。

甘地曾把“坚持真理”的非暴力斗争同消极抵抗做过严格区分。他认为消极抵抗是弱者的武器，其特征是这种形式的斗争起源于仇恨，最终导致暴力的发生。而非暴力抵抗邪恶的对象是恶，而不是做恶者。因为作恶者的内心深处也具有善性，只是由于其善性被情欲和实际利益所蒙蔽。非暴力抗恶的目的在于使作恶者觉悟，改恶从善。在政治上，非暴力斗争总是以不合法的形式出现，即不同实施错误政策的统治者合作。如果被统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统治者的任何政策都会大打折扣。然而，在一个野蛮政府的统治下，不做顺民，必然会付出坐牢、杀头等巨大代价。所以，甘地认为非暴力斗争是以自己

忍受痛苦和牺牲的行为制止做恶者继续做恶。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革命精神，才是精神上强大的表现。

同样，刘晓波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敌人意识成为中国人的遗传；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更把传统的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极端。”他倡导的“我没有敌人”的理念，是他勇于自省放眼未来的结果。为了尽力避免中国今后的政治斗争陷入无止境的仇恨和报复，他持之以恒地坚持非暴力抗争，虽多次入狱，终不改其志。

刘晓波不愧是条汉子，要说坐牢，他比甘地、曼德拉、昂山素季更不容易，因为他们对抗的政府多少还都有点儿法律和政治道德底线。他们出了监狱后还能参加竞选并从事政治活动，而刘晓波却死了在狱中。令人佩服的是，他深谙中国的政治现实的凶险，却心甘情愿地充当新时代的谭嗣同。他在给朋友廖亦武的信中曾说，“一个殉难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质。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更需要道义巨人，典范的感召力是无穷的，一个符号可以唤起太多的道义资源。例如方励之能走出美国大使馆，或赵紫阳能够在下台后仍然主动抗争，或北岛不出国。‘六·四’以后的沉寂与遗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一个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

刘晓波就是这样一个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人，在万马齐喑的年代，他依然拒绝谎言，不断探索，批判专制，捍卫人权，最终求仁得仁，成为一个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座丰碑，中国人追求民主宪政的一面旗帜。

中国大地上虽未留下刘晓波的骨灰，但他的精神遗产将对中国政治现代化产生深远影响。